

向宗鲁致庞石帚未刊手札四通考释

唐雪康

内容摘要:向宗鲁先生是上世纪初期四川重要的学者,截至目前,其人相关资料仍很匮乏。本文考释的向先生致庞石帚四通手札,写于1938-1941年之间,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部分地区人事情况以及四川大学中文系搬迁峨眉后的发展状况,可以从中看到向先生在战争年代,为学之艰辛以及对川大中文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了解其晚年事迹非常重要的史料。

关键词:向宗鲁 庞石帚 手札 四川大学

向宗鲁(1895-1941),名承周,字宗鲁,以字行。重庆巴县白市驿人。1937年起,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逝世。著有《说苑校证》、《校讎学》、《周易疏校后记》等。庞石帚(1895-1964),名俊,初字少洲,后因慕白石道人姜夔(又号石帚)歌词,更字石帚,亦以字行。原籍四川綦江。1924年后,历任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华西协成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光华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著有《国故论衡疏证》、《养晴室笔记》等。

向宗鲁与庞石帚是上个世纪初期四川重要的学者,且因二人同庚,故相交最为莫逆^①。近来,由白敦仁先生纂辑的《养晴室遗集》^②出版,内收庞致向信札四通,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两位先生的交谊,惜向致庞书一直淹没不见。2014年6月笔者从一川籍收藏家手中购得向致庞信札三通(带有四张原始信封,其中两张信封所装信笺合在一起正为一通书信),又从四川大学档案馆获得一通扫描件(带信封)。笔者将信中所著日期与信封上残存可见的邮戳两相对照,发现皆不相符,应该是在收藏中错置,因此不能反映其原始样貌。四封信札落款皆不著年份,经考证,写于1938-1941年之间。相比同时代诸多学者,有关向先生的资料较为匮乏,故此四通信札是了解其晚年事迹的重要史料。现将四通信札按所考订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略为考释。

①屈守元:《精于校讎的学者向宗鲁》,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②庞俊著,白敦仁纂辑,王大厚校理:《养晴室遗集》,巴蜀书社,2013年。

石帚仁兄先生左右：

别数十日，未尝一通书问，然相念之情，固无时或间也。归后舍伏案外，惟有偃卧。此间既无友朋之乐，又所谓新都者怪状百端，诸贵人言论动作非吾侪小人所解。不特不愿入城，苟非关怀战局，即报纸亦不欲入目矣。前致炳英^①书，谓于闰月中旬西上，而买票苦不易得，（前登记者已千馀号，今已停止购买，尚馀数百号也。）今仍无可为计。有友人王君（岷翁^②之世侄也），欲承周挈其女西上（其女肄业光华附中），谓与牛某相识，许为代买车票。惟其女至时，在省当有一二日句留，始可入校。承周拟请兄代商炳、岷二公觅一栖息之处，大约九杪十初当可相晤也。宦先生^③已出门教书，亦大佳事。新婚不如久别，他日重聚，当相欢逾常耳。伯彝^④过渝，承周适居乡，未得迎晤。及得信入城，则伯彝已行，怅惘无已。李氏善门乃得横祸，李大爷夫妇苟知此恶耗，当无生理。培公^⑤状想已如常，岷翁与周、赵掀局当亦重开矣。相见在近，不复一一。敬颂道安。

承周顿首，九月廿一日。

承周货宅易田已有端倪，数日内当可定局。新居甚宽大，请告炳、岷二公也。

按，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党跃武教授见告，本札原件在川籍书画家邓代昆先生处。所带信封内容为“成都苏坡桥温江县立小学 李校长墨林转 庞先生石帚启 航快 向宗鲁寄自巴县龙凤场”。邮戳显示信函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七月十七日由龙凤场寄出，七月十九日到达成都，明显与本札所署日期“九月廿一日”不符。但在笔者收藏的四张信封中，则有一张信封与之吻合。信封内容为“成都少城斌陞街二十六号 庞石帚先生大启 航空 向宗鲁寄自重庆都邮街同福春”。邮戳显示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二十二日由小龙坎寄出，九月廿三日到达成都，与本札所著日期完全符合。函称：“前致炳英书，谓于闰月中旬西上，而买票苦不易得”，“闰月”即应指1938年的闰七月。向先

①即李炳英（1889—1969），一名蔚芬。四川中江人。曾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中文系教授。

②即祝杞怀（1884—1941），名同曾，字杞怀，以字行。四川华阳人。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向宗鲁致庞石帚信中所称“岷翁”、“杞翁”皆指祝杞怀。案《尔雅·释山》“无草木岷”邢昺《疏》“岷当作杞”。

③由下文所揭1940年6月17日向致庞信“家事若何部署，宦女士当有卓见”句推之，应指庞石帚夫人。此承四川大学历史系王东杰先生赐见。

④伯彝：不详所指。由函中内容推测，似为向、庞二人友朋。

⑤即李培甫（1885—1975），名植，字培甫，以字行。四川垫江人。曾任华西协和大、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生每年暑假回重庆,是年原计划在闰七月回成都,后因买票不得而延迟。所以写信之时仍在重庆,要到九月末十月初川大开学之际再返学校。因此可判定本札写于1938年9月21日^①。

庞石帚《养晴室遗集》卷六有《亡妻谢兰仪事略》,是为悼念其妻而作。《事略》称谢氏:“体故未弱,凡生子女九人,保育勤至,遂患血虚喘嗽,绵历逾十载,竟以今年四月十日午刻卒于斌陞街二十六号新宅,年甫四十。新宅者,妻所喜也。余先寓二十七号祝氏宅且十年,新宅与对门,妻常悦其花木,因于去秋买而迁焉。庖湢衣衾,多所营构,又欲装置电灯,于卧室旁隙地杂植桃杏之属,将于花市时自往选树。何意迁居二百馀日,遽及于此,岂非命欤!”^②文末所著日期为“二十六年五月”(1937年5月)。据庞先生学生项楚先生回忆,庞先生在原配夫人歿后曾有续弦^③,函称“宦先生已出门教书,亦大佳事。新婚不如久别,他日重聚,当相欢逾常耳”,亦可印证此时庞先生刚续弦不久。《事略》所记庞先生在成都的住址,也与前揭信封地址吻合。

庞先生与祝妃怀交契甚深,祝氏歿后,庞氏有《哭妃怀》诗,其中忆及当年祝氏让出自己房屋的一边给庞先生居住的情况(与上引《事略》合)。诗云:“于时盛气类,城西名醉乡。遂割东头屋,招我连短墙。二家无异宾,骰核通略尝……绵绵逾十载,成就颠毛苍。窃乐少城居,徙宅还相望。”^④庞先生的新宅就在旧时所居祝宅对面,所以向先生请其代为与祝氏相商。

函中所涉“李氏善门乃得横祸”一事,因相关资料较少,尚无从查考。“咳翁与周、赵掀局当亦重开矣”句殊为费解。

二

石帚吾兄左右:

承示于炳英辞职事,计虑周详,情词恳挚。使此书早至三日者,于事或有所济。盖兄之所言,弟固皆早言之。兄之所虑,弟亦尝早虑之。惟以与炳英朝夕相见,其所陈说,易为炳英所忽。自石臞^⑤事发端以来,弟所以委曲调护,冀双方释嫌修好者,固已尽其力所能。至于石臞,尤反复开譬,不憚苦口。观石臞之意,似有所动,虽仍强词自解,此自少年恒情,不足怪也。炳英则谓受其威胁,情有不堪,于石臞可以不校,而此位不可复居。于学术前途未皇计及也。兄书早至,则力可回天。弟心中亦自有斡旋之

①此承四川大学中文系罗鹭先生赐见,谨致谢忱。

②《养晴室遗集》上册,第202页。

③此承戴莹莹女史代为询问,谨致谢忱。

④《养晴室遗集》上册,第127-128页。

⑤即殷孟伦(1908-1988),字石臞。四川郫县人。著名语言学家。曾任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术。炳英性急，一月三日晤觥公^①，四日晤程君^②，皆表辞意，而二君则既许之矣（炳英谓若不许辞主任，则教授亦不任，归家即不复来，故二君不得已许之），此弟所以憾兄书之迟迟也。弟前受炳英之侑，往访觥公，述炳英请其兼代。觥公则谓主任一席，莫逾兄及培甫，若不能致，即由弟暂代。弟以其长者，不敢掩耳，惟有藉词疾走（弟短于酬应，最畏与人交涉，故万不宜为此）。此弟发书前一日事也。是日，即宿岷翁处（岷翁次日即归省），苦诤石臞，石臞亦深以炳英之去为虑。次日归告炳英，炳英谓前事俱已释然，惟任此以来，备诸苦恼，今幸有可脱之机，詎容失去。弟亦谓炳英任此，弟之去就若有束缚，力劝其不辞，是自缚也（且似有希图固位之嫌）。故惟专意望兄，兄来则一切皆了，即培公亦或可致也。昨日得兄书，知二公不能遽来，炳英仍以守府之责见属。虑有他变，弟或当暂受其名，而不居其实（不参与会议，不问功课），终此一期，以待贤者。兹更有请者，昨日（四日）炳英与当局晤谈，当局切盼吾兄来此。（炳英云合津贴约近五百元实数。薪资可实支三百六十元，米之津贴在外。）今日之事，不能不虑及生计，兄审虑之。若华西可以脱卸，则主任之职仍当请兄任之。程、向及炳英皆同此论也（弟任有功课四门，中途不便易他人。若兄来，则弟之“历代文选”（本培公名义）、觥公之“诗”皆属吾兄（兄才固无所不可，而主任止任课二门），甚易措置。故主任此时仍以兄为宜，才力胜我不待言。）总之，兄本期能来最佳，否则明年下期必当与觥公共同负责。此不可不豫计而熟虑者也。敬颂箸祺。

弟承周上，一月五日。

徐侏岷翁面陈，想已晤对。

按，此函应写于1940年1月5日。向先生写作此函的意图主要是力劝庞先生来川大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屈守元《书李炳英先生事》：“我入四川大学第二年（1937年），炳英先生任中文系主任……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推行所谓‘党化教育’，派程天放为校长，极力扼杀教育、学术诸方面的民主自由，曾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1939年，川大迁到峨眉山，当时特务横行，对进步师生无理迫害。炳英先生在中文系经常遭遇到想不到的麻烦。1940年，他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推荐向宗鲁先生继任。”^③由此可定此函年份。

函中所称“石臞事”不详所指，据李炳英孙李法绪回忆，川大1939年疏散到

①即向楚（1877-1961），字仙乔，亦作仙樵，号觥公。四川巴县人。曾任四川省署秘书长、代理教育厅长、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

②即程天放（1899-1967）。江西新建人。1938年12月13日，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校长。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峨眉,许多老先生不能前往,因此李炳英从中央大学延聘了殷孟伦(石臞)^①。由此,李炳英对殷孟伦实有知遇之恩,两人之间似不会有过深的矛盾。函中称此事过后,向先生曾对殷孟伦“反复开譬”,而殷也“似有所动”。李炳英本人也只是觉得“受其威胁,情有不堪”。所以“石臞事”只是李炳英辞中文系主任职的导火线,而函中所述“炳英谓前事俱已释然,惟任此以来,备诸苦恼,今幸有可脱之机,诂容失去”才是辞职的根本原因。1938年程天放接替张颐代校长任校长后,川大教授以及部分地方绅耆即发起了“拒程”运动。1938年12月16日,由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领衔,联名致电教育部、行政院,强烈要求收回成命。在电文上签名的有六十多名教授,其中就有李蔚芬(炳英)和向宗鲁^②。吴虞1939年1月1日日记曰:“周癸叔来,言李炳英、魏时珍在所必宰。”^③周癸叔是程天放的文书主任,此话当非无据^④。或如屈守元先生所说,李炳英在中文系经常遭遇麻烦,以至于“备诸苦恼”,而如今“幸有可脱之机,诂容失去”。这似乎才是李炳英辞主任职的真正原因。

屈守元先生谓李炳英“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推荐向宗鲁先生继任”,与此函所言小有出入。函称:“弟前受炳英之侑,往访觥公,述炳英请其兼代。觥公则谓主任一席,莫逾兄及培甫,若不能致,即由弟暂代。”是李炳英本欲请向楚(时任文学院院长)代其职务,向楚则认为此职应由庞石帚及李培甫担任,因不能致,才让向先生任此主任一职。

此函最后还提到了庞先生来川大任教后的薪资情况。按照李炳英和川大当局晤谈的结果,如果庞先生能辞掉华大教职转到川大任教,则可拿到约近五百元的津贴,其中可实支薪资有三百六十元,尚不包括如米之类的津贴。这样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庞先生所在的华西大学。虽然华大是教会大学,但是工资却比其他的教会和国立大学低。根据《华西大学致哈燕社年度报告,1936、6、30-1937、7、1》的记录,这一时期华大教师的工资是:钟稚璩200元,朱少滨300元,杜奉符110元,陈家骥85元,庞石帚160元,郑德坤150元。以上还都是全职教师的工资,至于兼职教师,最高是68元,最低只有24元^⑤。如果1940年华大教师仍然保持这样的薪资待遇,则川大承诺给庞先生的薪资是其在华大的两倍多。所以向先生才在说明薪资待遇之后称“今日之事,不能不虑及生计,兄审虑之”,应该是有这方面现实考量的。

①《著名学者,爱国民主人士李炳英先生》,《文史杂志》2007年第5期。

②《四川大学史稿》编辑委员会编:《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6-207页。

③《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1页。

④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5年,第288页。

⑤转引自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三

石帚仁兄先生左右：

承周于前月廿三日别吾兄，出宿于三家村。次晨起行，夕宿内江，即闻警报，避地城隅。深夜反旅店，旋往路局讯问，知成都被炸区域，朋好所居幸皆无恙，惟闻华大略有损失。私意，是日适为星期，吾兄决未在校，方^①、钟^②诸公或当饱受虚惊耳。试验之不能如期蒞事，自可推知也。承周于二十五日至家，略事休息，未即入城。本月初二日赴红槽房访少韩，即宿其寓所中。方期次日赴石桥铺视文先生^③之疾，乃于小龙坎晤李君嘉会^④，始知文先生逝世已数日，临危尚不知药肆之被焚也。伤哉！使渝中不遭空袭，文先生得从容疗养，可以不死。承周不以畏空袭，故先至渝而后归乡，则先生虽死尚可得最后之一见。今则已矣，尚何言哉！李君言：文先生死南岸医院中，石桥铺乡寓已无人，其家人皆赴殓所。殓所安在，即李君亦不知也，乃雪涕而反。初六日，李君使人来告，文宅于七日成服，承周即奔往，今归甫三日也。炳英来成都否？时时在念。吾兄家中乏人主持，若允作峨眉之行，家事若何部署，宦女士当有卓见。商而后行，期于至当。如华大方面尚有可为，即亦不必舍去也。承周城中之屋，初撤去三分之一，越数日，又撤去若干，存者不及半，久已巷无居人矣。初意，归后不过五日即可读书，今十馀日矣，尚未得伏案一日也。祝、萧^⑤诸公想数相见，炳英若来成都，希以一纸相示也。馀俟续陈。敬颂箸安。

弟承周顿首，旧历五月十二日。

承周薪资，如炳英已反，即请其代汇。否则由兄或殷公直汇重庆大学彭用仪^⑥君（由美丰银行最便）。私章在炳英家林玉书处。

按，此函应写于1940年6月17日，由文伯鲁逝世即可推知。文伯鲁是向先生的老师，对其有知遇之恩。1908年，先生考入巴县中学，文伯鲁恰在此校任国文教员，对其非常器重，并常在经济上予以资助。1909年，先生考入川东师范后，又在文伯鲁的资助下，于1911年进成都存古学堂读书。1922年，文伯鲁姻亲苏泰馥托其在重庆聘请教师到武汉私塾教书，文伯鲁即推荐先生任文史

①应指方叔轩(1894-1982)，又名方睿，方孔祖。四川成都人。曾任华西协成大学教务长、副校长。

②应指钟稚珪(1886-1963)，又名钟正琳。重庆永川人。1928-1943年任华西协成大学中文系教授。

③即文伯鲁(1886-1940)，字寿昌。重庆巴县人。曾任川东师范学堂校长，重庆大学教授。

④李嘉会，生卒年不详。武昌大学数学系毕业。早年由文伯鲁推荐，与向宗鲁一道在武汉私塾任教，教数学。时任重庆市私立依仁小学校长。

⑤即萧仲伦(1885-1961)。四川井研人。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⑥彭用仪(1899-1994)，重庆巴县人。曾任四川大学化学系教授。

讲席。1930年,文伯鲁、彭用仪等又邀其执教重庆大学,先生遂从武汉西归,任重大中文系主任^①。1935年,重庆大学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文伯鲁不愿远离家乡,辞不就聘,遂推荐先生前往^②。文伯鲁逝世后,先生曾作《忆文伯鲁》诗悼之,诗曰:“当代几人成大隐,不夷不惠见吾师。名羞画饼抛来久,学悔雕虫谢去迟。在阙青衿宁是福,登楼皂帽未全痴。药笼暂作偷生计,剩有风规似陆圻。”^③

文伯鲁晚年,专心研究中医学,并在重庆开设药房,使其弟文仲宣在此挂牌行医^④。函称:“始知文先生逝世已数日,临危尚不知药肆之被焚也。伤哉!使渝中不遭空袭,文先生得从容疗养,可以不死。”“药肆”应指文伯鲁所开药房。这一时期,日本由于受欧洲战场德国法西斯接连取胜的刺激,为配合政治诱降活动,达到日本政府企盼的“使重庆政府屈服”之目的,日本军队在此年5月18日拉开了针对重庆、成都等后方城市的“101号作战”序幕。由于“101号作战”计划的实施,重庆遭受的轰炸较之以往呈现出更猛烈、更广泛的态势,并且随着空袭力度的加强,日军对重庆采用了无差别式的轰炸,无论军事设施还是民用住宅、学校、商业设施等,均遭到狂轰滥炸,摧毁殆尽^⑤。吴虞1940年6月2日记:“重庆炸弹死伤二千余人”^⑥,又于1940年7月16日记:“渝自五月初旬,敌机每日光顾,全城已成灰烬。”^⑦文伯鲁所开药铺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段的轰炸中被焚。

信函开头提到向先生在内江听到防空警报后去路局询问成都被炸区域,“朋好所居幸皆无恙,惟闻华大略有损失。私意,是日适为星期,吾兄决未在校,方、钟诸公或当饱受虚惊耳”。结合此函写作日期和日军此一时期对成都的轰炸情况,这里的“是日”应该指1940年5月19日。日军在实施“101号作战”计划后,在5月18日夜到19日夜,共有18架日军轰炸机在小谷编队长的指挥下分三批由鄂北飞入四川,对成都、温江、遂宁等地进行轰炸^⑧。根据日本当时的报纸《新新新闻》以及四川省防空协会编《防空月刊》所刊载的《成都市空袭统计表》,两批日机先后于5月18日20:50左右和21:15左右飞抵成都市上空进行轰炸,第三批日机在成都附近的温江投弹30枚后遁去。此次空袭成都共投弹100枚。到5月19日,日机21:00左右再次飞抵成都,在成都主城区外北、

①罗元晖:《校注留青史,爱国传后代——向宗鲁先生简史》,第22-27页。

②文复阳:《先父文伯鲁在辛亥革命前后》,《巴县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年,第85页。

③《先父文伯鲁在辛亥革命前后》,第86页。文字依《巴蜀近代诗词选》订正。

④《先父文伯鲁在辛亥革命前后》,第85-86页。

⑤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8-153页。

⑥《吴虞日记》下册,第832页。

⑦《吴虞日记》下册,第835页。

⑧谢春燕、刘世龙:《关于日军对成都实施的战略大轰炸》,《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4页。

南两机场投弹96枚^①。由此函可知,华大在此次轰炸后“略有损失”,由于5月19日恰好是星期日,华大教师诸如庞先生、方叔轩、钟稚珪等人应该都不在学校,只是“饱受虚惊”。

《养晴室遗集》卷七有庞石帚先生《答向宗鲁》一通^②,此函用极其典雅的文言写成,且多为四六双句,与《遗集》所收另外三通致向先生信风格迥异。内容为婉拒向之邀请至南迁峨眉的四川大学教书一事。信札所署日期为“七月十六日”,不著年份。笔者推断,应写于1940年7月16日。1939年4月,川大校长程天放决定将校本部和文理法三院迁至峨眉。同年6月,先由水陆两路运送图书仪器。学校原定8月中旬在峨眉临时校舍复课,后因临时校舍建筑不及,交通不便,图书仪器搬迁延期等,直到9月21日才正式上课^③。庞先生1939年7月12日曾致函门生王仲鏞,称:“川大方面,仙樵诸人亦再三致意,欲使同上峨眉,以为华大既无可为,而深山比较安全。”又谓其“顷便发函坚邀宗鲁先生,或当得其一诺。方面多自以此公为最好,但川大亦挽之至紧,早下聘矣。今就大局及私交固请之,或有希望”^④。由此知川大搬迁峨眉之时,向楚(时任文学院院长)等人曾邀庞先生同上峨眉教书,其时川大已对向先生下了聘书,庞先生此时亦想就大局及私交论,请向先生来华大任教。由此可知,《答向宗鲁》信亦写于1940年无疑。信称“月前重辱手书,要游峨眉,顷令外甥龚君来,复承华翰,敦谕再三,循览皇悚”^⑤。其中“月前重辱手书”或指此向先生6月17日致庞先生函。盖向先生6月给庞先生去信后,又使外甥龚君带信至成都,再三相邀。庞先生难辞其请,遂作此极为典雅之复书,以南下峨眉任教有“三疑”加以婉拒。

四

石帚仁兄先生左右:

两奉手教,久迟还答,半以病故。而于川、华两校去就之计,尤有寤寐不宁者。殷公迭致四书,言辞恳挚。盖川大于弟去后,觅替人不得,无以为计。华西有兄及培公,弟虽不至,于功课无所阙遗。比日成都惨遭空袭,老父尤兢兢,谓为危地,不欲弟留成都,且欲兄之离省违难也。川大下期将办研究所(国学及化学),此事乃承周历年祈向,今竟得偿。然此非吾兄来峨眉主持,则发展不易。炳英来书亦以为言,望吾兄孰计之也(炳书附呈)。岷翁遂成永诀,痛何可言!曾作诗哭之,苦不佳耳。耆孙处已复书,他日赴省,当与兄同谒墓隧也。敬颂道安。

弟承周顿首,七月七日。

①《关于日军对成都实施的战略大轰炸》,第475页。

②《养晴室遗集》上册,第271-273页。

③《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第209页。

④《养晴室遗集》上册,第301-302页。

⑤《养晴室遗集》上册,第271页。

华西聘书来省时奉缴。

按,此函应写于1941年7月7日,由祝杞怀逝世可推知。吴虞1941年7月7日日记称“祝杞怀七月三号去世”^①,逝世时间正在向先生写此函前几日。祝氏体弱多病,早年患有肺病,重至咯血。川大迁至峨眉之后,上课需登二百多阶石阶,久而久之,导致祝氏咯血旧疾发作。等到暑期放假,“先生移家归成都,适酷暑为二十年未有,汽车行烈日中数百里,愚窃为先生虑。果讣至,先生竟日咯血,卒于家”^②。

据四川大学档案记载,1941年7月25日,教育部批准国立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和理科研究所化学部成立,所长分别为向楚和张洪沅。同年,两所正式招收研究生。9月26、27日报名,29、30日考试,11月新生入校^③。函称“川大下期将办研究所(国学及化学)”即指此事。

向先生写就此函时,应是在巴县老家。由函中内容可知,庞先生其时请先生来华大任教,且已寄来聘书。而先生念及自己去后川大难寻替代,因此拒绝了庞的邀请。不仅如此,先生还力邀庞来峨眉主持川大下学期将成立的文科研究所,并称办研究所一事,是其“历年祈向”。庞在向先生歿后曾致信向楚,函称:“宗鲁平日懒于书札,自去年以来,频频执讯,则必以川大中文系为言。知其专精于此,欲有所为。”^④由本文所揭1940-1941年向致庞的三通书信观,内容皆涉邀庞任教之事,足见先生对川大中文系付诸的心血。其“欲有所为”事,即1941年下期川大将成立的文科研究所。可就在成立工作已陆续开展之时,向先生竟于1941年11月11日逝世^⑤,研究所也因此失去主持人,最终宣布停办^⑥。向先生的逝世,对川大中文系发展而言,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以上是对向宗鲁先生致庞石帚先生四通手札的整理与考释,可以从中窥见向先生交友、志业以及晚年诸多事迹。函中所述日军对成都实施的战略轰炸,四川大学中文系搬迁峨眉后在人事变迁、薪资水平、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况,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可供有关学者研究取证。

【作者简介】唐雪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近现代学术。

①《吴虞日记》下册,第859页。

②李思纯:《祝杞怀先生事略》,《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1卷第9期,1941年12月1日。

③此承四川大学档案馆党跃武先生代查档案,谨致谢忱。

④《养晴室遗集》上册,第274页。

⑤王利器:《亲扶向师旅榱归旧山》,《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⑥罗元晖:《校注留青史,爱国传后代——向宗鲁先生简史》,第30页。